

爵士时代的挽歌 ——从消费主义视角解读《夜色温柔》

冯锦澜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0; 2300250037@qq.com)

摘 要:现实生活为作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的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彼时的美国社会充斥着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和道德沦丧,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特征,并将其融入作品之中。在以往对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美国梦”这一视角来进行分析,而本文则选择从消费主义这一独特的视角入手,对他的代表作《夜色温柔》进行分析与解读。在此作品中,菲茨杰拉德刻画了20世纪初美国消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风貌以及消费主义浪潮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

关键词:《夜色温柔》; 消费主义; 人际困境

引言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空前繁荣。而这一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恰巧在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期之内(1923—1929年),所以该时期的经济繁荣被称为“柯立芝繁荣”。柯立芝政府采取减税政策,将美国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一战刚结束后的73%一路下调至25%。同时还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国家债务,使联邦债务在其任期内减少了约30%。

此外,该政府还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美联储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1920年代中期维持较低的贴现率水平,显著低于当时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在其任期内,美国经济蓬勃发展,GNP上升50%,工资水平上升50%,道琼斯指数上涨一倍多,失业率到达3.3%的历史最低水平。1920-1929年,美国经济增长了42%,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稳居世界首位,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商品大量出口,占据过去由英德控制的市场,一战后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彼时消费主义文化迅速兴起,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爵士时代”。大规模生产使得商品空前丰富,广告业的蓬勃发展和分期付款等新型消费方式的出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是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身份象征。

在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刻画了20世纪初美国消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风貌以及消费主义浪潮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本文从符号消费现象、商品化的人、异化的个体、破裂的人际关系四个方面分析《夜色温柔》,探讨消费文化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消费文化将人物化为商品,导致个体精神空虚、人际关系疏离,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1. 符号消费: 物质表象下的身份构建

商品符号价值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将这一消费模式定义为:通过浪费性的消费让人了解消费者的财富、权力和身份,从而使消费者获得荣誉以及自我满足的消费行为[1]。这一理论突破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传统商品价值体系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元框架,阐释了商品符号意义的核心内涵。消费文化将商品赋予某种意义,商品的功用由单纯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变得复杂起来。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体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消费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2]。”即消费者对商品的符号意义的追求远远地超过了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消费者可以通过所选择的商品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他者也可以通过消费主体所购买的商品来辨识消费主体的社会地位及身份。

小说中描写了丰富的消费场景,比如主人公们在里维埃拉的度假生活,这里的豪华酒店、游艇派对都是符号,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文中一开始出现的海滩不单纯是旅游景点,“这里已经成为显贵名流们的避暑胜地[3]。”海滩表面上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消遣与享乐,实际是消费主义符号的浓缩舞台。菲茨杰拉德赋予了海滩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深刻揭示了爵士时代物质繁荣下的精神荒原。海滩往往让人联想到消遣、休闲、娱乐,而在这片海滩上,人们除了享受这种惬意的生活外,更看重的是它所象征的身份与地位。“消费者不仅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特定的社会位置和群体归属的人[2]。”里维埃拉海滩被严格划分为公共区域与私人领地,这种物理空间的区隔实则是社会等级的符号化投射。迪克他们的装备——四把遮阳伞搭起的一个凉棚,还有一间活动更衣室和一只橡皮充气马,都是罗斯玛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这些是战后奢侈品制造业第一批爆发的产物,他们可能是第一批买主[3]。”人们通过购买和使用这些奢侈品来彰显他们作为上流人的身份和地位。

小说中妮可的消费行为也体现了符号消费现象。在为了旅游采购物品时,她的采购清单长达两页纸,另外她还买了一些摆在橱窗里的东西,其中包括了一些“她喜欢却自己又不太用得上的东西[3]”。这些东西对于妮可来说其象征价值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比如“黄金和象牙做的旅行版象棋[3]”,这种奢侈品就是一种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妮可沉浸在由符号象征体系所编织的世界里,通过体验物品的符号价值来获取满足。就像鲍德里亚所说的,“支出的增加,以及仪式中多余的‘白花钱’竟成了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的地方[2]”。人们的炫耀似消费方式所追求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符号越来越多的引领着人们的消费导向,符号也更多的成为了个个阶层划分自己等级的标志。

2. 商品化的人:消费社会中人性物化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中,由于社会分工精细,其中的个人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4]。小说通过罗斯玛丽、迪克和妮可等人物的命运,深刻揭示了消费社会中人物如何被商品化。

罗斯玛丽的美貌是她最显著的资本。在小说中,她的美貌被反复强调,成为她吸引他人关注的重要工具。然而,在消费社会的环境中,她逐渐将自己物化为一种商品,试图通过自己的美貌和身体来换取爱情和物质生活。罗斯玛丽作为好莱坞新星,其存在本身就是消费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极致物化。她以“银幕甜心”的形象闯入戴弗夫妇的精英社交圈,将美貌作为流通货币,将身体转化为资本。而她对迪克的迷恋,本质是试图通过情爱交易换取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迪克试图通过与妮可的婚姻获得上流社会的身份和地位,而妮可则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通过符号重新标示了社会成员,并将其与一定的社会团体、社会等级相联系,于是,消费之目的变成了对社会地位的谋求,变成了对差异性的追求[2]。迪克对妮可的喜爱,恰在于她所代表的贵族般的虚荣和财富,这种虚荣和财富正是上流社会的符号象征。而妮可也将自己商品化了,她试图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爱情的价值,在迪克拒绝她时,“有一瞬间,她怀着绝望的念头想要告诉他,她多么富有,她住在多大的房子里,她真的是无价之宝[3]”。这正体现了消费主义逻辑下,人被物化为商品,以物质价值来衡量自身的价值。

在父女关系中,妮可始终处于被剥削的弱势处境。华伦先生不惜重金将女儿送往瑞士接受治疗,看似彰显着父爱,实则是将女儿作为维护社会声望的“风险投资”。鲍德里亚曾指出,消费社会中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本身,对于特权的社会结构来说,这是自我维系的必要条件[2]。华伦先生的行为正是这种不平等逻辑的体现,他将女儿的康复作为掩盖性侵丑闻、维系自身社会形象的工具,而女儿的痛苦和需求则被完全忽视。这种消费主义逻辑对妮可的自我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她逐渐依赖于他人对她的评价和物质回报,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正如罗伯特·戈德曼所指出的,“商品逻辑将人视为原子化的个人,强调个人选择、个人赋权和个人独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将自己视为商品本身,成为经济理性的可计算的主体[5]”。妮可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成为他人眼中的符号和商品,而不再是独立的个体。

华伦家族用金钱和资源购买迪克,将他视为一种可以满足妮可需求的工具。他们看重迪克的才华和魅力,认为他可以成为妮可康复和幸福的关键。华伦家族对迪克的“商品化”揭示了资本对知识精英的深刻影响。他们利用金钱,将迪克的学术身份与婚姻契约绑定,构建了一条以资本为核心的服务链。“华伦家族要给妮可买一个医生[3]”,这一表述不仅暴露了资本对知识精英的物化,也揭示了财富阶层对知识再生产的操控机制。通过资本的持续投入,迪克被赋予了多重身份:他是华伦家族的家庭医生,是需要定期维护的人形医疗器械,更是家族声誉的防火墙。

3. 破裂的关系：消费逻辑下情感疏离

鲍德里亚认为，“商品逻辑已经变得普遍化，今天不仅支配着劳动过程和物质产品，而且还支配着整个文化、性和人际关系 [2]”。当人际关系进入到消费品的行列，就注定沦为商品化的互惠的关系，曾存在于关系中的温暖的部分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黯然出局。持久和坚定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稀缺，忠诚、永恒和稳固也逐渐被人遗忘。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深刻揭示了消费文化的盛行下人际关系的困境。这部作品将亲情、友情、爱情在消费主义浪潮冲击下的扭曲与破碎展现得淋漓尽致。

书中的亲情，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姐妹关系，都是冷漠且自私的。华伦先生，这位外表看似光鲜、实则灵魂丑陋的父亲，与女儿妮可之间发生了乱伦的不堪往事。当事情败露后，他毫无愧疚与担当，冷酷地将妮可送走，仿佛她是一件沾染了污渍、有损家族声誉的物品。这种亲子关系已被金钱和家族利益彻底侵蚀，亲情的温暖与关怀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与控制。贝贝和妮可这对姐妹，同样未能逃脱亲情冷漠漩涡的吞噬。她们从未真正交心，姐妹之间缺乏扶持与关爱，仅有表面的客套与疏离。由于消费文化的富裕特征，人们在虚伪物品的无声凝视下生活，彼此实际上却愈发疏离。贝贝沉浸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物质享受之中，对妮可的内心世界和痛苦经历不闻不问；而妮可，在经历家庭创伤后，对贝贝也充满戒备与不信任。她们的关系恰似两条平行线，虽同处一个家庭，却在情感上相隔千里。还有斯皮尔斯太太，她将自己的女儿当作获取金钱和地位的工具，进行情妇式的培养。在她眼中，女儿的身体和青春成为了换取物质利益的筹码，亲情被彻底商品化。这种对亲情的践踏和利用深刻反映了消费文化对人性的扭曲。

在友谊方面，有闲阶层的聚会沦为虚伪与功利的集散地。他们聚集在一起，并非为了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感悟，而是互相吹嘘和攀比。他们谈论着自己的财富、房产、汽车和社交圈子，试图通过这些外在的物质象征来彰显自身价值和地位。在这种场合下，人们缺乏共同的精神追求，彼此之间缺少真诚的理解和尊重。他们所谓的友谊，不过是建立在物质和地位平等基础上的一种社交游戏，一旦有人在这场游戏中落败，便会立刻被排斥和遗忘。迪克便是最好的例证：当他事业有成、风度翩翩时，周围人无不投来羡慕目光，纷纷与他攀附交好，试图从他身上获取利益和资源。然而，当迪克陷入困境，事业受挫、经济拮据时，那些昔日朋友却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许小委认为，消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受到“快乐原则”的支配，交往和共处都以追求快乐为目的 [6]。当一段关系无法再带来快乐，反而带来束缚和限制时，根据快乐原则，这段关系就被迫终止，无须其他理由和解释。这种基于利益的友谊，在消费文化的侵蚀下，显得如此脆弱和虚伪，让人对人性的温暖和信任产生怀疑。

书中的爱情，无论是婚姻还是婚外情，均以悲剧收场。迪克和妮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金钱和物质基础之上，而非真正的爱情和信任。迪克被妮可的美貌和财富所吸引，而迪克不仅是妮可的丈夫，更是她的医生和看护人。他们在婚姻中各取所需，却逐渐迷失自我。随着时间推移，妮可逐渐痊愈，迪克就慢慢失去了他的价值，而被华伦家族抛弃。这段婚姻恰似一场精心策划的交易，当交易筹码失去价值时，婚姻也随之土崩瓦解。迪克和罗斯玛丽的爱情同样难逃悲剧命运。他们在最初相遇充满浪漫和激情，然而这种爱情在现实消费文化面前显得脆弱不堪。罗斯玛丽的年轻和美貌吸引迪克，迪克的才华和成熟也让罗斯玛丽着迷。但是在迪克不断地抗拒并接受妮可的金钱资助，沉迷于各种狂欢式的生活时，他渐渐地荒废了工作和学术研究。在情感上，已变得成熟的罗斯玛丽再也不把他当作仰慕的对象。最终，他们的爱情走向幻灭，成为消费文化下一场短暂而虚幻的梦。

4. 异化的个体：消费文化中精神迷失

迪克最初是一位有抱负的精神科医生，但在与妮可的婚姻中，逐渐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他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和妮可一起出入各种高档的社交场合。这种追求使他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一次次的度假、派对中，他享受着休闲的生活，这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劳动和工作。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就是区别与劳动时间的束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 [2]。在不得不随着妮可加入这种休闲式生活的过程中，他原本对医学研究的热情被物质享受所取代，进而逐渐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这让迪克慢慢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和挣扎的境地。尽管与妮可结婚后，迪克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变得极度空虚。他感到自己被消费主义所吞噬，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迪克成为华伦家族买来的“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商品的劳动者失去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所有权，并受到自己生产的物品的压迫和控制，这一过程即使对劳动者的异化 [7]。”迪克在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和职业的挫折后，感到自己被消费主义所吞噬，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他试图通过回归医学研究来寻找自我，但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医学的热情。他在社交场合中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上流社会的生活。他的挣扎和无奈体现了消费社会中个体在面对物质诱惑和精神困境时的无力感。

妮可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她的精神世界却极度空虚。她通过消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如购买大量的奢侈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等。然而，这些消费行为并不能真正满足她的内心需求，反而使她变得更加孤独和痛苦。她的精神疾病也与她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她的消费行为成为她逃避现实和内心痛苦的一种方式。妮可频繁地投身于各种社交活动，穿梭于豪华晚宴、盛大舞会以及高档俱乐部之间。她试图在人群中寻找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期望通过参与这些社交场合来获得他人的关注与认可，以此来填补内心的孤独。然而，这些消费行为并未真正触及她内心深处的需求。在繁华的表象之下，妮可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愈发深刻的孤独与痛苦。这一时期虽然达到了物质繁荣的高超，同时却也标志了社会上、精神上的深刻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随着新世纪的进展日渐加深。妮可与周围人所建立的关系，往往基于物质与利益的交换，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与深度交流。这些关系的表面化与功利性，使得她在人群中愈发感到孤立无援。

5. 结语

在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中，消费文化的影响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人们在物质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把符号当成了价值，把人当成了商品。商品逻辑侵入了人际关系，让亲密与信任变得脆弱，只剩下功利和冷漠。这部作品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虚荣和浮华，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在提醒我们，在今天的消费社会，我们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不能让消费占据一切，不能让情感和人性被冷冰冰的物质取代。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要关注精神世界，守护人性的温暖和真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

参考文献

- [1] (美)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M]. 商务印书馆, 2017.
- [2] (法)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第3版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3] (美) F·S·菲茨杰拉德. 夜色温柔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4] (美)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第2版 [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5] (美) 罗伯特·戈德曼 / (美) 斯蒂芬·帕普森. 符号战争: 广告叙事与图像解读 [M].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8.
- [6] 许小委. 消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论齐格蒙特·鲍曼的消费主义思想 [J]. 理论界(10), 48-51, 2013.
- [7] 李磊. 消费文化导演的现代悲剧——解析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里的主人公 [J]. 外国文学研究(4), 117-123, 2010.